

进退维谷：货币化的人情与人情化的货币

——基于华北某村人情往来的思考

王继远 赵天宇 王渭 王荣玉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省 成都市 610041)

摘要：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燕京学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接续功能主义与社区研究脉络，在中国开展了广泛的类型学调查，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持久的经验材料与分析框架。某种程度上，其意图在于以结构-功能分析法为方法论原则透视中国的社会结构，连点成线、以线成面，进而回答“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本文某种程度上接续上述脉络，以相关经验材料透视一定类型下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力图从经验材料与分析框架两方面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贡献力量。

关键词：礼金；农村；农人

一、田野点概述

田野点位于华北平原最北端的山区，明长城北向脚下。行政隶属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与河北省迁安市毗邻。村庄依山傍水、沿路而成。自有史建村以来，与周边聚落互通有无。建国后依照国家农村发展建制安排，历经生产队、生产组、人民公社、分到户等多种组织形式。村庄地处山区沟谷，人均耕种面积小、耕地分散、耕种经济产出有限，不具备大面积垦荒种植可能。[1]主要农作物为玉米、甘薯，主要鲜果为苹果、梨，主要干果为板栗、核桃[2]。受自然与经济环境影响，村庄畜牧业为小规模家庭生产模式，尚未形成具备地区品牌特色、成规模经营发展的村庄优势产业[3]。

在城乡双轨制发展的前提背景下，田野点与其他广大农村地区同样处于资源相对贫乏、发展相对滞后、模式相对单一的二元结构下，地区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农牧业资源的产出交换，劳动力被束缚在城乡区隔的静止割裂的土地上。随着城乡人口流动成为可能，大量适龄劳动力进城务工[4]，可观的经济收益填补了传统农业产出与农业交换的收益空白，某种程度上也为农村注入了经济活力，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与蜕变。近三十年的人口流动以及随之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一方面将乡村传统社会结构无保留地融入市场经济，某些传统逻辑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如阎云翔所谓“爷爷变孙子”、“妇女上了天”；另一方面，乡村传统逻辑似乎在外界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出现了异化倾向，典型表现在相对贫乏的经济现实与差序格局下人际互动的矛盾与割裂，如存在于广泛婚姻市场中的所谓“丈母娘经济”。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田野点时空日益淡化、行为主体日益难以把控的趋势下，将农村社区看作孤立、封闭的原始社区的观点难以继。阐释经验材料与建构理论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农民社区与外界的深层次、多方面联系，正如克鲁伯所言农民社区是“部分的社会与部分的文化”。

结构与理论最终需要忠于每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行为主体，也就是生活于农村社会里的每一位农人。追溯他们共通的特性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农村正在发生什么以及缘何为此。作为农村代际行为与家庭权威主体的中老年农人是农村叙事链条上关键的一环，透过他们的经历、境遇与情感，似乎能够隐约感受到埋藏在经验事实背后的逻辑与结构。

来自田野的经验材料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思考：其一，几乎共通共同的外出务工经历。农人群体共享城乡人口流动由封闭到开放，感受到了城乡在客观条件上的不均衡，非凡可观的经济效益不仅满足了物质的迭代，一定程度上还为行事逻辑增添了理性的考量。其二，生于关系网络、困于人情世故、终于熟人社会的生活轨迹。外出务工的经历并没有让大多数农人完全脱离乡土社会，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个人归宿上，务工只是致富的手段，并没有将个体与既得的关系网络完全剥离。农人群体的轨迹是流动的，在流动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城市化”，而传统的“乡土色彩”也不再纯粹。其三，代际权力的弱化与代际分离的期望。带有印欧人家父长色彩的男性家庭权威在生产方式多元化以及经济产出理性考虑的作用

下，代际权力逐渐削弱。衡量家庭地位的指标由颇具罗马法色彩的纵向亲属关系位置让渡于具有自然法色彩的同质的经济产出能力。权力弱化后，更加明确地划定了“分内之事”与“分外之事”的界限，生活居处等诸多方面更加突出自身的独立，表现为代际间空间与情感的疏离。其四，乡土生活的执念。农人群体似乎普遍地将农村在空间上视为一生的归宿，外在表现为对农村生活熟悉与惬意的体验，内在根植于城乡二元差异的范畴分类以及对农民身份无奈的认同。在矛盾与徘徊中依旧选择了最为保守，尽管可能带有苦痛未来的前行选择，可能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条仅有的、无法选择与割舍的道路。

二、人情与礼金的纠葛

近些年来，乡村高昂礼金现象一石激起千层浪，场域内不仅有“饱受折磨”与“渔翁得利”的参与双方，还有无数种思绪、无数个家庭叠压在一起的风俗合力。天价礼金存续与凋亡的背后，是皆大欢喜的阖家团圆还是代际与时间前后的难以言说的不公与无奈？田野场域在发生细微的、难以把握的变化，政府、社会、行为主体、道德、利益等都被卷入其中。某种程度上，家庭之间的往来被上升为社会问题乃至民生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似乎可以带有偏颇地认为，乡村社会如同走在两条道路之间的荒草丛，不伦不类，充满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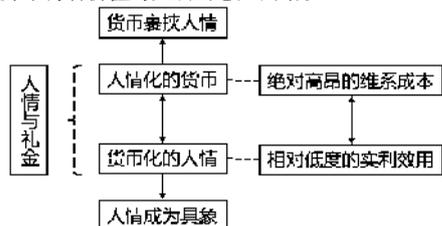
矛盾首先表现在人情礼金与日俱增。在打工潮的作用下，客观提高的收入与潜移默化的都市逻辑冲击了传统的乡村互惠机制。礼金在数额上水涨船高，在形式上推陈出新，在结构关系上有所颠倒。金额从象征性、可接受的二十元、五十元上涨到三百元、五百元、一千元……原本是欢腾的纪念仪式也出现了种类繁多的巧立名目，节日某种意义上不再是为了纯粹的祝福与期盼，多了经济的考量与盘算。在波兰尼所谓经济脱嵌的历史范畴中，金钱货币成为了衡量人情的重要维度，表现为人情化的货币，即经济裹挟人情。对于至亲而言，以人情为外衣、耗费不计成本的迎来送往是摆脱不掉的，一旦妄想冲破结构，则意味着家际归属的消失，也即家庭内部的社会性死亡。对于非至亲而言，社会网络的展开正是依赖于以货币为载体的人情互惠，倘若拒绝上述动态的交往，无异于自断出路。

上述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现状，而使社会事实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在于功能结构的转变。单个或累计的礼金在数额上是脱离经济产出的，家庭花销不得不为礼金做出充足的预算而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节奏。据访谈得知，田野点的纯务农利润每年至多不会超过五千元，而礼金支出占四成甚至更多。每个访谈对象在谈到全年主要的支出项目时，均将礼金作为最高的花销，痛苦而无奈。在这种条件下，既得与获得的关系出现了层次的区分，亲朋好友按照不同的准则划分为核心与边缘，人际交往更加注重投入与回报的实用性。亲属交往在情感维度表现出必要与非必要之分，人情逐渐物化，人际关系逐渐理性化。农人对此的选择与盘算是具有独到眼光的，因为亲属关系是动态的互动过程，一旦接受了既定规则下的迎来，就务必要面对未来一定存在的送往。高昂的维系成本是绝对的，经济收入

增长难以匹及“就高不就低”的礼金变化，每个家庭在囿于上述境地时，也在考虑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减少损失与尽可能多地获利。

矛盾另外表现在人情生活日渐失范。某种程度上，互惠交换已经不单单是义理层次的互动，还掺杂了更加复杂的博弈，原本模糊的人情伴随理性的模塑呈现具象化的趋势。行为主体在按照差序格局行事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带入了机械与功利的标准。终于，礼金簿上的数字成为了衡量关系网络是否存在与延续的砝码，本属于模糊意义网络“道德之债”的互动动机也演变成了明码标价的有借有还。具象的人情无意识地带来人际交往的准入门槛，交际首先表现在砝码是否能够交付，其后才是情感能否交融。值得深思的是，被排除在门槛之外却具有交际互动必要的群体、原非交际圈层之内但又交付了具象事物的群体以及未按照差序位次交付同质货币的群体，均会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这三种人群其实存在已久，但在人情能够以更加具象的货币充分表达的当下，杂糅其它客观因素的量变积累，最终突破了质变的度，模塑了如今的农人交际现实。

极端功利地推演，倘若这一切最终能够换回值得付出的回报，逻辑是否成立、人心是否复古倒也无可非议。但现实恰恰在于，高昂的持续付出换来的仅仅是期待未来收礼的执念以及相对低度的实利效用。田野点的材料告诉我们，即便是至亲，日常的交际交往也屈指可数，甚至对核心家庭发展的贡献是需要重新评估的。突发事件以及重大事情上的帮衬是确实存在的，不过这与本文所讨论的相对低度实际效用是并行不悖的。进一步来说，日常若即若离的互动、欢腾时脱离现实条件的礼尚往来，二者杂糅与模糊在人际互动网络的矛盾之中。人情是否亏欠、礼金是否相称，也都在一次又一次迎来送往的欢腾之中重新定义了关系的边界与疏离。农人在矛盾的场域中，默许一切无奈的存在，也在不间断的流动中，用具象的礼金模塑并维持着价值与归属的意义网络。



三、选择

基于上述讨论，似乎感觉农人群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但事实远非如此。上述提供的是带有理想型色彩的极端推演，但作为行为主体的农人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能够结合自我的特殊结构做出最佳、最理性的选择。在经济脱嵌的逻辑下，选择大体可以围绕礼金是否在场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首先是参与式的互惠，即礼金到场。具体而言，能够细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即礼金与人俱到、礼金到而人不到、人到但礼金不充分。三种情况中，最尽善尽美的是第一种，人们愿意花费相对高昂的礼金亲自到场表达关系的亲密，即便目的是出于情感无奈或是功利使然。在这种情况下，关系网络的维系十分自然，不会引起舆论的关注。这也是最常见的表达，绝大多数情况下代表了区域内社会道德与风俗的基准与原则。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在内涵上并无别致，区别仅仅在于因为客观现实条件无法到场。集体对此在多数情况下是默认的，其中人情的货币与货币的人情化现象表现得极为突出。具象且等额的物质表明了参与者的态度，能够引起讨论的不过是人情的相对缺失，不过这也在实物的补偿下被消解了。需要注意的是第三种情况，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几乎均为经济方面的窘迫。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在矛盾情境下仅存的能够维持关系网络的活动，情感的联结远胜于物化的人情。礼金的交付是秘密进行的，不写入礼金簿，舆论也会避免涉及，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不合时宜。在此条件下，最重要的莫过于关系双方的私人情感，也就是说在此之中存在非常灵活以及特殊的影响因素。不过，倘若条件允许，谁又会多此一举地小心谨慎与自找麻烦呢。

另一种是放弃式的选择，即礼金不到场。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为人不到场，其二为人到场。二者都昭示着关系的中断，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远的。显著的区别在于当事人到场会引发更强烈的舆论反响，不过这毕竟是极少数的情况，人们更多会以默认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也是整个区域的交往逻辑所允许的。在此之后，关系网络陷入难言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既得与获得的亲属关系依旧存在；另一方面，剥离了具象的人情又会因表征符号的不完善而失去应有之义。

在先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互动关系主要建立在人情之上，人们更多地在意心意相通。随着各种因素的杂糅作用，货币成为了关系建立与维持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关系建立与维持的过程中，二者彼此纠缠、不能分离。缺乏人情维度，关系显得更为僵硬；缺乏货币维度，关系则显得游离失控。通过农人群体的实践选择，能够看到关系网络虽不具备极端的功利色彩，但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增加了理性的考量。人情难消，矛盾也紧随其后，所幸在张力之间多了感性的粘附，一切得以自洽与发展。

四、总结

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呈现出奇异的发展逻辑，我们很难说出这种逻辑来源于哪里。各个要素如此复杂地交织，却以简单直白的形式表现出来。按照功能学派的观点，作为有机整体而运转的社会抛开任何单一因素都是不圆满的。来自田野的经验材料向我们证明，这种逻辑也表现为乡土社会礼金与人情在文化碰撞与交融中不断模塑而成的自洽的社会结构。

货币化的人情与人情化的货币根源于城乡双轨制发展的社会条件。具体表现为绝对高昂的维系成本与相对低度的实利效用，在此基础上人情成为了具象化表达的货币，货币裹挟着人情颇有些商品拜物教的色彩。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人情与礼金这一小切口透视乡村的发展逻辑，矛盾永远存在，但表现形式会随着时空的发展产生新的变体。农人在此情境下也并非是被动的接受者，基于主体特殊的亲属圈层、圈层位置、经济条件等因素，会做出能动的选择。一切似乎完美地自洽与循环，可在平静背后，却隐隐约约嗅到了一丝波澜。

注释

[1] 据《青龙满族自治县村镇志》，田野点 2015 年全村总面积 723.46 公顷，其中耕地 47.08 公顷、园地 90.17 公顷、林地 254.13 公顷、其他土地 332.08 公顷。2015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48.13 公顷，粮食总产量 254.7 吨，亩产 353 千克。

[2] 据《青龙满族自治县村镇志》，田野点 2015 年鲜果总产量 430 吨，其中以红富士、国光为主的苹果总产量 183 吨。以核桃、板栗为主的干果总产量 15 吨。

[3] 据《青龙满族自治县村镇志》，田野点 2015 年全村大牲畜存栏 3 头，其中马 2 匹，驴 1 头。猪存栏 990 头，出栏 1258 头。牛存栏 55 头，出栏 76 头。羊存栏 603 只，出栏 435 只。家禽存栏 2233 羽，出栏 16183 羽。畜产品产量 199.8 吨，其中猪肉 112.8 吨、牛肉 11 吨、羊肉 4.7 吨、禽肉 19.3 吨、禽蛋 52 吨。

[4] 据《青龙满族自治县村镇志》田野点 2015 年乡村从业人员 550 人，其中第一产业 295 人；第二产业 216 人，其中外出从业 44 人；第三产业 39 人，其中外出从业 25 人。

参考文献：

- [1] 乡土中国[M]. 三联书店，费孝通 著，1985
- [2] 私人生活的变革[M]. 上海书店出版社，龚小夏译，2006
- [3] 巨变[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波兰尼，2013
- [4] 大转型[M]. 浙江人民出版社，(英) 波兰尼，2007
- [5] 礼物的流动[M]. 上海人民出版社，李放春、刘瑜译，2000

本论文为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最后的农人——一个华北村庄留守老人的民族志”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10656008。